

杨国荣 主编

知识与智慧

——冯契哲学研究论文集
(1996—2005)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知识与智慧

冯契哲学研究论文集
(1996—2005)

主编 杨国荣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与智慧: 冯契哲学研究论文集: 1996~2005/杨国荣主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10
ISBN 7-5617-4479-X

I. 知... II. 杨... III. 冯契-哲学思想-研究-文集
IV. B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9756 号

知识与智慧

冯契哲学研究论文集(1996—2005)

主 编 杨国荣
特约编辑 张正江 李 明
责任校对 王丽平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
业务电话 上海地区 021-62232873
华东 中南地区 021-62458734
华北 东北地区 021-62571961
西南 西北地区 021-62232893
业务传真 021-62860410 62602316

http: // www. ecnupress. com. 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1902 16 开
印 张 15. 75
字 数 364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5 年 11 月第一次
印 数 2 100
书 号 ISBN 7-5617-4479-X/B·252
定 价 25.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智慧的沉思

(代序)

杨国荣

自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在半个多世纪的思想跋涉中,冯契先生既历经了西方的智慧之路,又沉潜于中国的智慧长河。对人类认识史的这种沉思与反省,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及时代问题的关注。从早年的《智慧》到晚年的“智慧说三篇”,冯先生以始于智慧又终于智慧的长期沉思,为中国当代哲学留下了创造性的篇章。

以智慧的探索为中心,冯契先生的哲学思考涉及中国哲学史、认识论、价值论、伦理学、美学、逻辑学等各个领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其代表作是三卷本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一卷本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如书名所示,冯契先生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考察,侧重于揭示中国古代哲学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及科学的比较方法,冯契先生梳理了中国古代哲学演进的历史脉络及其中的逻辑环节,并深入地分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历史特点。冯契先生对认识论作了广义的理解,认为它包括如下四个问题:第一,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第二,理论思维能否达到科学真理?或者说,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第三,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首先是世界统一原理、宇宙发展法则)?第四,人能否获得自由,或者说,自由人格或理想人格如何培养?在冯契先生看来,中国传统哲学在关注前两个问题的同时,又对后两个问题作了更多地考察,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的问题,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贯穿于整个中国哲学史;正是在对这两个问题的考察上,显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

就名实之辩而言,冯契先生认为,相对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较早地发展了辩证逻辑;每当中国哲学达到总结阶段时,哲学家便从不同方面对辩证思维的形式进行考察,深入地阐发辩证逻辑的原理。在先秦哲学的总结阶段,《荀子》、《易传》、《内经》初步形成了辩证逻辑的系统;到宋明,从沈括、张载到王夫之、黄宗羲,辩证逻辑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冯契先生同时认为,与辩证逻辑的早期发展相应,中国较早地发展了辩证法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以气一元论为基础,将“道”理解为阴阳的对立统一。辩证逻辑与辩证的自然观对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作了肯定的回答和多方面的考察。冯契先生的这一看法没有停留于所谓中国人“重人生轻自然、长于伦理而忽视逻辑”的流行之论,它在相当程度上深化了对中国传统认识论和自然观的理解。

在人的自由问题上,冯契先生认为,相对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更多地考察了自觉的原则,而对自愿原则则有所忽视,后者容易导向宿命论。冯契先生对正统儒学的宿命论倾向作了深入地分析。按冯契先生的看法,自由不仅是伦理学及认识论的问题,而且也涉及美学。在美学上,冯契指出:西方人比较早地提出了美学上的模仿说(再现说)和典型性格理论,而中国人

则比较早地发展了美学上的言志说(表现说)和意境理论。冯契先生的这些看法基于对中国哲学的长期沉思,它将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关于中国近代哲学,有见于其剧烈变革的社会历史前提,冯契先生研究的侧重点主要在于其“革命进程”。按照冯契先生的看法,中国近代哲学以“古今中西”之争为其背景,具体围绕着如下四个问题展开,即历史观、认识论、逻辑和方法论、人的自由和理想。这些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理气(道器)之辩、心物知行之辩、名实之辩、天人之辩在近代的延续和发展,同时又受到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影响。随着进化论的输入,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开始拉开帷幕。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则使哲学革命由进化论阶段发展到唯物辩证法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历史观与认识论的论争逐渐结合起来,成为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主线,最后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作了总结;逻辑与方法论及人的自由和理想的论争,在中国近代未能作出系统总结,冯契由此提出了“进一步发展哲学革命”的问题。这些考察,既清晰地梳理了中国近代哲学演进的脉络,又将近代哲学的变迁与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联系起来,使历史的考察成为哲学重建的起点。

哲学史与哲学的统一,是体现于冯契先生哲学研究过程的一个基本原则。对以往哲学的考察,总是处处渗入他的哲学见解;而他的哲学思考,又伴随着对以往哲学智慧的总结。这种总结,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的“智慧说三篇”中。“智慧说三篇”由三部相互联系的著作构成,这三部著作即《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早在青年时代,冯契先生便“真正感受到自己有一个哲学问题非要解决不可”,这个问题就是知识与智慧的关系。如前所述,冯契先生对认识论作了广义的理解,认为它不应限于知识论(theory of knowledge),还要研究智慧问题,要讨论元学(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等问题。这些既涉及具体经验领域的知识,又涉及关于性与天道的智慧,元学与知识论统一于广义的认识论。

按冯契先生的理解,广义的认识过程包括两个飞跃,即从无知到知的飞跃和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由无知到知的过程发端于实践中获得的感觉,这种感觉能够给予客观实在。冯契先生认为知识经验领域无非是以得自经验者还治经验,得自经验者即是概念,用概念来摹写和规范经验,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由此形成了知识经验。作为知识经验主体的“我”,运用逻辑范畴进行思维,运用归纳与演绎相统一的接受总则统率经验领域。形式逻辑与接受总则即构成了普遍有效的规律性知识之所以可能的条件。

经验知识涉及的是名言之域。在冯契先生看来,认识并不限于经验领域,它同时指向性与天道,后者即是智慧之域。如果说认识论的前两个问题主要关联着经验知识,那么,智慧则更多地涉及认识论的后两个问题。就具体真理而言,其最高的形态可以归结为世界的统一性原理和发展原理,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即是关于性与天道的认识;而关于道的真理性认识又内在关联着人的发展,后者便展开为自由的人格。冯契先生肯定,逻辑思维能够把握具体真理:人能够在有限中认识无限,在相对中揭示绝对,而这一过程即表现为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就对象而言,通过如上飞跃,自在之物不断化为为我之物;就主体而言,精神由自在而自为,自然赋予的天性逐渐发展为自由的德性,从而达到理想的人格。

知识所注重的是有分别的领域,它可以用名言来把握。就表达而言,知识是由命题(包括特殊命题与普遍命题)分别地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并以语句加以陈述;就所表达(所知)而

言,则是把对象区分为一件件的事实,一条条的定理,以把握事实及事实和条理之间的联系,知识经验的领域即是以名言概念来区分的世界,无论是特殊命题,还是普遍命题,其真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冯契先生认为,与知识不同,智慧所把握的是有关宇宙人生的根本原理,它的目标是求穷通,亦即穷究宇宙万物的第一因和人生的最高境界,揭示贯穿于自然、人生之中无不通、无不由的道,并进而会通天人,达到与天地合其德的自由境界。总之,智慧追求的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无限的东西,“这就是难以言传的超名言之域了”;而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便相应地意味着从名言之域走向超名言之域。

如何实现从名言之域的知识到超名言之域的智慧?冯先生从理性直觉、辩证综合、德性自证诸方面作了考察。转识成智的飞跃,旨在领悟有限中的无限,相对中的绝对,这种领悟往往是在顿然之间实现的,它表现为哲学上的理性直觉。理性直觉包含着感性和理性的统一,它通过破而超越对待,通过立而揭示相对之中的绝对,由此达到天人、主客、能所的统一,而这一过程本身又实现于认识的无限的前进运动。通过理性直觉达到的领悟,必须以辩证的综合来论证和表达。冯先生区分了总名与达名,达名表示的是最高的类,总名所表示的是元学的理念,亦即大写的 Idea。总名可以看作是达名的辩证综合,如时空范畴便是达名,当我们在有限中揭示无限、在瞬间把握永恒时,便是以时空范畴作辩证的综合,以表述超名言之域。与辩证综合相联系的是德性的自证。理性直觉与辩证综合的主体是我,我不仅有意识,而且能自证其德性,亦即对自己的德性作反思和验证,在言行一致的活动中自证其德性的真诚与坚定。

可以看看,从无知到知、又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既是知识论的问题,又是元学或本体论的问题。以广义的认识论为基础,冯先生对知识论与本体论作了沟通,并由此展示了统一本体与现象、名言之域与超名言之域的独特思路。

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作为性与天道的理论,属于超名言之域。理论不能仅仅停留于形而上的层面,智慧学说在超越名言之域的同时,又要始终保持与知识经验和具体人生的联系。冯契先生以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概述了以上关系。化理论为方法,主要说明认识的辩证法如何通过逻辑思维的范畴,转化为方法论的一般原理。在《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中,冯契运用客观辩证法、认识论、逻辑相统一的观点,吸取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类、故、理等范畴,建立了一个辩证逻辑的范畴体系。化理论为德性,则是指将认识的辩证法贯彻于价值领域,在实现真善美理想的过程中,培养自由的人格。在《人的自由与真善美》中,冯契对此作了深入的论述。这样,主体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中转识成智,又通过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而不断地向知识经验与现实人生回归,知识与智慧、名言之域与超名言之域展开为一个基于广义认识论的动态统一过程。

哲学自其诞生之时起,便与智慧结下了不解之缘。冯契先生以智慧说上接哲学的源头,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吸取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思维成果,他的理论,即可以看作是对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总结,又表现为对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回应。作为一种开放的体系,冯先生的智慧说当然并没有终结中国哲学,但它无疑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

目 录

智慧的沉思(代序).....	杨国荣(1)
冯契先生的智慧哲学与本体思考:知识与价值的辩证统一.....	成中英(1)
智慧的探索——读冯契“智慧说”三篇.....	朱德生(7)
冯契对金岳霖本体论思想的转进.....	郭齐勇(13)
“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略评冯契先生“智慧说”.....	丁祯彦(25)
冯契先生的哲学研究路向.....	张天飞(31)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选择——兼论冯契的人格理念.....	宋志明(34)
“天人合一”的现代诠释——冯契先生“智慧说”初论.....	高瑞泉(40)
转识成智——冯契对时代问题的哲学沉思.....	陈晓龙(48)
试论冯契先生的“终极关怀”.....	闵仕君(57)
感觉经验能否给予客观实在——从洛克到金岳霖和冯契.....	童世骏(65)
对智慧探索历程的逻辑概括——论冯契建构的逻辑范畴体系.....	彭漪涟(73)
冯契对休谟问题的解答.....	王向清(84)
认知的界限和求通的智慧——论冯契先生的广义认识论.....	高 敏(92)
冯契科学逻辑思想初探.....	晋荣东(98)
化理论为方法——冯契对中国近代逻辑思想革命的总结和超越.....	李朝东(107)
冯契对辩证逻辑研究中两个疑难问题的解决.....	梁庆寅(116)
论辩证思维推理的基本原则——读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札记.....	贺善侃(121)
向德性伦理回归——解读“化理论为德性”.....	任剑涛(126)
化理论为德性——论冯契先生的自由价值观.....	李振纲(130)
追求自由与善——冯契伦理思想初探.....	陈泽环(136)
冯契“平民化的自由人格”说申论.....	吴根友(146)
冯契伦理思想探析.....	戴兆国(153)
冯契美学思想初论.....	蔡志栋(159)
从“认识史”到“智慧说”——20世纪9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趋向.....	陈卫平(166)
谈冯契对中国传统哲学价值的认识.....	臧 宏(169)

论冯契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	柴文华(177)
“前现代”的中国哲学史书写：以冯契为例·····	方旭东(183)
冯契对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贡献·····	洪晓楠(189)
从“形式化”到“理想形态”——冯契对金岳霖概念论超越的一个侧面·····	张梦飞(197)
冯友兰“境界说”和冯契“智慧说”的比较研究·····	刘 海(202)

附录

I Feng Qi's Ameliorism: Between Relativism and Absolutism ·····	Huang Yong(207)
II Philosophy: Recent Trends in China since Mao(节选)·····	Lin Tongqi(229)
III 冯契传略 ·····	童世骏(231)
IV 冯契哲学思想研究论文存目(1996—2005) ·····	(240)
编后记·····	(243)

冯契先生的智慧哲学与本体思考： 知识与价值的辩证统一

成中英

冯契先生的哲学是从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冲击、变革与对其反思中提炼出来的。他的哲学思想不但具有丰富的时代精神与社会生活体验,更具有对自然与社会认识的反思与对此反思的反思的智慧,这自然形成了他的哲学思想的辩证结构与内涵。他把以下三方面的哲学课题贯串起来,组合成他的哲学三重奏或三部曲:第一,他面临的哲学课题是“古今中西”之争,深入到中国人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检讨,此正是重建现代中国文化与社会的走向所必须面临的课题。他把这一课题直接联系到如何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因之提出了人们必须认真地去把握中国文化与哲学自身的发展规律。第二,冯契先生为了理解人之为人的本质以及掌握人的理性本质与实践自我及社会的价值理想,不能不建立一个哲学架构来掌握与引导人从认识世界到转化世界的活动过程,解决主客的统一与知行的统一问题。解决此一问题的重要性不但在于其理论的探索,而且在于其现实及实践意义。第三,只有基于此一哲学的架构,我们才能谈会通中西的必要以及如何去会通中西的哲学与文化。冯契先生对中西哲学的会通有极为深刻的理解与研究,他的思考不但为中国哲学开发出一条可行的道路,而且为未来的人类思想找寻到一个可期、可信与可爱的价值理想。

在冯契先生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显然是以第一与第二课题为经、而以第三课题为纬的。这显示出他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与重建有莫大的关切和投注,同时也显示出他在考察中国哲学问题的关头,更深入地思考了人类所面临的根本哲学问题,其中包含认识论与历史观的关联问题、逻辑与方法论的统一问题、自由与价值的互基互动问题。最后,他结合哲学思考与对历史的反思,提出了、也发展了他对人类智慧的本体理解与说明。他的智慧哲学绝不是偶然的成就,这是他的哲学的终结,也是他创造性的哲学智慧的开花与结果。

我们如从冯契先生的哲学的全面发展来考虑,可以得出下列对他的哲学卓见的理解与发挥,并就此理解来展开对冯契先生智慧哲学的进一步研究。

第一,冯契先生对“古今中西”之争有一个基本认识,他不但把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看成是中西文化的论战,也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差别看成是中西文化的差别。显然,中西文化的差别又有古今思想的差别的涵义,因之在深入理解科学与玄学、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根源及其代表的价值时,对两者相容的重要性也就要有进一步的肯定。冯先生甚至看到,真正解决中西古今之争的方案在于结合科学之知与玄学之知(元学之知),即在于统合知识与价值、知识与智慧。智慧的一个涵义是对价值的认识,故统合知识与价值,就是把知识与智慧联系在一起。由此可见,所谓知识,是以科学之知为代表的,而他所说的智慧则是以人生的价值需要为内涵的。但必须同时指出的是,智慧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智慧的普遍性,体现在所有人的价值需求上

面;另一方面是智慧的特殊性,体现在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上。为了获得智慧,我们就必须保存、探索与开发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哲学传统。

冯先生曾就“可爱的”元学要求与“可信的”科学要求求教于金岳霖先生。金先生站在实证论立场区分两者,但却未真正解决两者的沟通问题,也就无法联系知识与智慧了。冯先生表明,他的出发点是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即尽量吸收各种学派包括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些合理因素。这个出发点显然既能够区分元学的要求与科学的要求,又能够结合两者来发展人的个别与集体潜力,实现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这个立场不但表明了冯先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一个非自我封闭的开放系统,可依之来会通中西,解除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矛盾,而且更表明冯先生有一颗自由思考的心灵,这是他创造价值理想的根本源泉。他说:“哲学家如果不能始终保持独立人格,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那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哲学家。”^①他并引用荀子《解蔽篇》来说明:“故口可劫而使默云,形可劫而使屈伸,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②这也直接说明了智慧是一种价值,是要用心灵去创造与体会的。无疑,在这样一个对智慧的理解中,冯先生自己就是一个有极高智慧的哲学家。

第二,依我的理解,冯先生是把知识看成纯理论性的,而把智慧看成实用方法性的和实践规范性的,具有强烈的指导与实践意涵。他所提出的“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箴言,充分表明了冯先生从知识中追求智慧的热诚与信念。但更重要的是,这个箴言包含了一个辩证法的真理:人们必须解除心灵的蔽执,把理论看成是活用的方法,才能真正精益求精,发展理论,真正批判旧论,创造新知。从本体诠释学的眼光来看,理论的另一方面就是方法,正如方法的另一面就是理论一样。方法的局限性反映了理论的局限性,因而必须开发新方法以开发新理论,这是人类知识发展的途径,也是冯先生研究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史的道路。正因为我们可以把理论化为方法,我们不必把唯物辩证法的理论生吞活剥地套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相反地,我们可以从中国哲学的发展史中去找寻辩证成果与逻辑的结构,这才是辩证法的辩证的应用、逻辑的逻辑思考,这也才是理论化方法、方法化应用的实际。所谓“化”,就是活的探索、活的发现、活的思考、活的应用。至于“化理论为德性”,冯先生的意思是:不仅要把理论当作工具,也要把理论当作目的与价值,用它来克服种种实际困难,刻苦磨炼自己,形成智慧个性。也许可以这样更深入地说,“化理论为德性”是把理论当作真理,用它来指导生活、充实生活、实践价值。这当然涉及信念的问题。要对理论有充分的信念,人们才能始终如一地实践理论,造就信实人格。这一要求自然建筑在如何把理论当做价值,视它为真理,用它来实现善与美。今日的许多中外哲学研究者大都缺乏这样的信念,也就少了实践这一段。无疑,冯先生的这个提法是有见于中国哲学的知行合一的重点要求而来的。

第三,实际的哲学智慧必须从自身的哲学传统中去探索和发掘。冯先生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探索就是对智慧的探索,而智慧的探索也就体现在对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生观、世界观等的理解上面,因为智慧的根源就是一个民族的经验凝聚。反思、批判与实践的成果,贯串在宗教、道德、艺术、科学等文化领域里面。就中国哲学史而言,中国的哲学智慧尤其可以归结到中华民族最原初而又贯彻始终的性与天道合一的体验与信念上面,冯先生对此有极为深刻的认识并在他的著述中一再予以强调。这个“天人合一”的体验与信念,见

①② 冯契著:《智慧的探索——智慧说三篇导论》二之2,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之于儒家与道家的宇宙生命创造理论,宇宙自然创造了万物与人类,是为天地之大德,道德之自然。我个人认为,这可以溯自易经悠远的观象察变的生命意识及其体验。冯先生极其清晰明白地描述了此体验如何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以及此一思维方式的演化与发展形态,这就是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的历史反思与重建。这个历史的发展是辩证的,冯先生的反思与重建也是辩证的,是他把理论与方法相互转化的结晶。

第四,此处要加以说明的是,冯先生是从比较哲学角度来看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与转化,以见其内涵智慧的发展。如果我们把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与转化看成六个阶段——即创生阶段、整合阶段、融合外来传统阶段、再整合阶段、再融合外来传统阶段、新整合阶段(相应于先周时期、先秦时期、隋唐融合佛学时期、宋明再创时期、现代融合西学时期、未来再创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冯先生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整合阶段、融合印度传统阶段与近代中西哲学的会通阶段有着特别深厚的理解与观察。如他在智慧学说上所指出的,中国佛学的顿悟说就是印度佛学“转识成智”与中国道家 and 儒家智慧的结晶;宋明哲学所讲的“理一分殊”,显然也来自易学与佛学的结合。冯先生再据此说明中国佛学的影响,以说明程朱的“用敬与致知”(定慧双修)与王阳明的“致良知”(顿悟)等等所隐含的中国佛学智慧,因之进一步说明了中国智慧的辩证发展与成长。但当中国的智慧进入近现代,面对西方科技强权的侵入,它却无法立即发挥融合的生命力,几乎造成中国文化与民族的整个覆亡,理由又何在?回答是:此一不幸归根结底当然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内在腐化与衰朽所导致,正是由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极需要进行革命性的改革与更新。冯先生对此一变革所包含的政治制度革命、思维方式(方法)革命、价值观念革命有着极其深刻的透视。

第五,现代中国文化与哲学智慧的再生,显然一方面需要深化对传统经学权威主义与独断主义的批判,以求解放被陈腔滥调所束缚的生命力、学习力与创生力,另一方面也要认真地发掘、继承和发扬传统中促进发展与创造的智慧(方法论与价值观),同时更要批判地学习、引进和吸收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知识与智慧。这当然是一个十分艰巨的变革与创生过程,需要各方面协作来解决问题,但哲学家的工作的重要性却不容忽视。冯先生认清哲学家工作的非常重要性,极力要在智慧的更新与创生上指出方向、提出箴言、探索基础理论、厘定实践目的。

第六,基于以上理解,我认为冯先生首先作出的贡献就是正确地指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逻辑思维特点与中西会通的前卫工作要点。中国较早地发展了素朴的辩证逻辑,却抑制与漠视了形式逻辑的发展,即使到了明清之际,实证科学方法也未能形成。相反的,西方却较早地发展了形式逻辑体系,到了现代又率先发展了实验科学方法,两者结合又形成了科学的辩证逻辑。面对西方的冲击,现代中国虽已能重视西方的先进贡献,并在古代中国的墨经与清代的考证之学中找到了中西结合点,但我们对自己原有的辩证传统与认知方法又有多少深入认识和正确评价呢?我们对近现代西方哲学方法上的问题与价值的矛盾有多少系统的批判与认识呢?显然,在中西比较与会通问题上,中国哲学家还得多下工夫。在价值理论方面,冯先生指出,中国伦理学偏向重理自觉主义,与西方伦理学偏向重意自愿主义形成一个对照。这是一项灼见,值得吾人深入探讨。事实上,这也就是中国的人性(性理)主义与西方的自由意志主义的对照。这个对照不是要我们舍中就西或排西保中,因为两者都有它内在的、社会的矛盾后果,不能简单地非此即彼、非彼即此。这个对照真正提示我们,要从人的存在与结构深处进行基础探讨与思考,在人的性、理、情、欲等方面掌握价值创生的本质与人格意志自由自主的涵义,这

样才能开辟出新的理论框架,呈现高明广大的哲学境界。也唯有如此,我们方能够会通中西,融合矛盾的两端,建立一元多面、一体多用的动态思考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正是需要一种对根源本体的思考以及基于此一思考对历史传统中的知识论、方法论、价值论作出逻辑的、辩证的诠释与融合。

第七,基于对中西智慧的比较研究与关切,冯先生提出了几个极为重要的基础的本体思考原理,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与探讨。他提出的基础本体思考原理是: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的互动原理;抽象思考与具体思考的互动原理;知识转化为方法与价值(转识成智)的辩证原理;人的自由与真善美价值的互依互现原理。

最后我要加一个“本体诠释与诠释本体的互动原理”,以说明冯先生的智慧哲学的本体性与诠释性。这些原理构成了冯先生的智慧学说或智慧哲学的重要内涵,也是他对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精到总结,更是他开发、创立的中西会通的基本框架与价值标准。

冯先生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起点问题是:一个人如何由无知到有知,然后到有智慧?为了回答此一问题,冯先生提出了认识世界以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以认识世界的知的辩证发展过程。他的灵感得之于金岳霖先生的“以经验之所得还治经验”,但他更为强调所得与还治的交互作用,把金先生之箴言概括为“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因之,经验能够提升为知识、知识能够发展更多更精的知识,甚至升华为智慧,这事实上也就是科学知识的发展过程。冯先生用从无知到知的矛盾动态考察来说明,因之,人的理性在这一过程中起了转化经验为知识的作用,也起了提升理性机能走向智慧的作用。

更值得注意的是,经验不只是感知,成为引发理论知识的资料,经验也是人的意志与情感的经验,在反思中也成为引发意志与情感的自觉资料,并因之具有引发人之心性主体之知与自觉的力量。换言之,客体之知(认识世界之知)与主体之知(认识自己之知)具有相互开发、相互发明、相互界定与相互钻深的作用。就主体来说,不但主体意识在此过程中建立,主体的根源性与本体性(整体性)意识也从中确立,再由此带动超越主客意识的价值理想与目标,发挥主体经由实践转化与创生客体的力量。此一转化与创生的主体实践力量,事实上就是结合客体与主体的本体力量(当然也就是经由知识形成的主客分别的纯理性力量)。分合都在本体,但都经由主体的自觉与主客的互动来实现。从方法学立场来看,这一互动转化与创生的过程当然是一项理性的辩证的过程,它包含了理性的分辨、理性的限制、理性的超越、理性的整合等部分,溯源于经验的次序,也导向更宽阔的理性与生命次序。在此一辩证的过程中,主体之知自现实中引发理想(即价值)、吸取理想、转化现实,逐渐实现了人的自由性与创造性,也就是在创造了科学之真、道德之善与艺术之美的同时,体现了人的心性(人格)的自由,也可以说在创造了人的自由人格之同时也体现了真、善、美的价值。冯先生有段话说得最好:

“人类在化自在之物为我之物的过程中,发展了科学、道德、艺术等,同时也就培养了以真善美为理想和信念的人格。人们不仅按照理想来改变现实,也按照理想来塑造自己,取得越来越多的自由。自由人格就是有自由德性的人格,在实践和认识的反复过程中,理想化为信念,成为德性,就是精神成了具有自由的人格,所以人格是承担理想的主体,也是实现理想的结果。”^①

^① 冯契著:《智慧的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32页。

很明显,在这个人的自由的创造过程中,人的文化也就创生,文化、价值与自由就是人实现其人之为人的个人与社会的实践过程。人的智慧是人的价值创造的一般条件,但人的自由性与自我创造性显现为“思维由抽象到具体”与“转识成智的飞跃”两方面。

第八,基于冯契先生对真善美价值的探讨,我们可以作出以下的发挥:真善美的价值来自人的心性,而人的心性又根植在宇宙本体,故人的价值世界既是人的心性的呈现,又是宇宙本体的呈现,同一呈现贯穿两个层面。价值当然不限于心性的创造,宇宙的创造也是价值,更是心性创造价值的资源价值,这也可以说就是人能够在自然万物中找到真善美的缘故。真是价值创造的起点与基础,因真而求善而求美,因善因美而求善之真、美之真,并因以改善真的表现内涵与表现方式,如此构成一个真善美互基互动的本体诠释圆圈。如从生命的维护角度来看,我们也当把功利价值看成价值的基层部分,这与人的物质性(身)的存在有关,但身心的辩证统一却能提供功利价值与心灵创造的价值辩证统一。这辩证的统一指的是任何对立双方可以相互矛盾,但也可以转化为互为条件,更可以经由矛盾促进更高层次的协作和发展,也就是不但消除了矛盾,更达致一个包含相辅相成、动态开放、生生不已的两端的整体。

真善美的创造是在历史文化的具体方式与一定形式下实现的,如求真要在科学与哲学的探索中实现,真表现为知识与真理的形式;为善则在伦理与道德的行为中实现、善表现为德性与德行的形式;创造美要在不同的艺术与审美活动中进行、美表现为艺术和文艺的形式。而真善美的实际内容则因不同文化传统的偏向透露不同本体性的素质。因之,我们必须承认真善美的具体实现是多元的,正如承认人类文化的传统与习俗是多元的一样,但这不必表示具体的真善美不能抽象出普遍性的性质与原则,反映出主体、客体与本体内涵的普遍真理。就主体而言,真善美的创造显露和实现了人的意志与生命自由;就广义的价值的创造而言,也是如此,价值创造愈多愈能显露和实现人的意志与精神自由。这意味着人们追求自由必须通过价值的创造,自由既是价值创造的先天形式又是价值创造的后天成果。同理,我们也可相应地说,价值创造既是自由的充分表现,又是实现自由的必要过程,两者互为表里、互为因果。这不但因为两者都是人的本体创造能力的表现,更因为两者的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的关系正是人的本体创造能力实现的根本方式。以上诸点是冯先生的真知灼见所在,冯契先生对此有非常明确的认识与表达。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分别人的自由为内在自由(意志自由、精神自由与个性自由)与外在自由(生命自由与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自由),我们可以探讨内外自由相互影响与制约的关系,从而注意到作为实现人的内在自由的价值能够导向人的外在自由的实现;相反的,外在自由的基本保障也是启发与维护内在自由与价值创造的重要机制。

如上所说,冯契先生十分重视民族文化在现代化中的特色表现。如就理论来说,现代化不能排除价值的创造活动,事实上真的价值的创造就需要科学与哲学的探索活动。科学的探索已有固定的活动形式,本质上是独立于民族文化特色的知识探索。但哲学的探索却不能不涉及民族文化传统的思维方式与价值理想等,因而是内含于文化活力与结晶的智慧探索。知识的探索与智慧的探索并不矛盾,正如知识与智慧并不矛盾一样。冯契先生提出“转识成智”,旨在说明知识能够也应该提升为智慧之光,这是由于人能够对知识及其应用作出深刻的哲学反思所致。在善与美的价值创造方面,冯先生提到中西伦理学与美学各自重视的方面有所不同,但这并不表示两者的不同不可在一个更深沉的层面上融合为一整体。事实上,伦理学上的理

性自觉(中国伦理学的偏向之一)与意志自由(西方伦理学的传统偏向之一)是可以在对人的本体思考中调和与整合为一体两面的互动结构的。两个方式不但不相排斥,且因其相互对照,丰富了人的价值内涵与创造空间。

总结以上八方面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冯契先生的智慧哲学、价值哲学是与中国哲学的开发与重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三者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时也表现了极高度的辩证的统一,这是冯契先生作为一个现代中国的哲学家所作的不可磨灭的永恒贡献。

(原载《学术月刊》1997年第3期,作者系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

智慧的探索

——读冯契“智慧说”三篇

朱德生

1996 年末,我接到冯契先生家属惠赠的《冯契文集》一、二、三卷(即“智慧说三篇”),读后,感慨良多。冯契不仅为我们留下了“智慧”的体系,而且留下了探索智慧的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体系难免有时间性的局限,而追求真理的精神却是永恒的。

冯契先生探索智慧的精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定哲学要解决现实问题,才有生命力;二是坚信哲学家要保持独立人格和自由探索的精神,才能有所创造。

他说:“真正的哲学都在回答时代的问题,要求表现时代精神。”^①这种时代精神不是抽象的“共相”,更不是时髦的口号,而是通过思想家个人的遭遇和切身感受体现出来的极有个性的思想。他强调指出:“一个思想家,如果他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看到了时代的矛盾(时代的问题),就会在他所从事的领域里(如哲学的某个领域里),形成某个或某些具体问题。这具体的问题,使他感到苦恼、困惑,产生一种非把问题解决不可的心情。真正碰到了令人苦恼的问题,他就会有一种切肤之痛,内心有一种时代责任感,驱使他去作艰苦、持久的探索……没有真切的感受,便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著作。”^②

这段话使人想到 20 世纪 80 年代关于哲学要反映时代精神的讨论。这种讨论看到了哲学在生存上的危机,但也有不少观点形式上是为了使理论更密切地联系实际,实际上却不从自己的切肤之痛去发现问题并体会时代的脉搏,而是试图站在世界以外来说这个世界,还自以为要对之颁布悲天悯人的永恒真理。这不是无病呻吟又是什么呢?本来,理论要体现的时代精神,并不像一道数学题似的,其得数人人都是一样的;与此相反,时代精神体现在诸多答案中,即体现在极具个性的真实的人生体验中。所以,企图通过讨论以便得到一个人人都得按此来求解的公理式的时代精神,实际上并不理解哲学如何来反映时代精神。因此,这些讨论都只能是或者不了了之,或者把政治权威的思想当作时代精神。

数十年来,我们一直强调理论要联系实际,但是却往往把联系实际置换成为联系政治权威或时尚的思想。今天理论失去了群众的信任,便是此顽症的突出表现。为什么结果会和初衷如此背反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即不允许研究者从自己的真情感去提出问题、回答问题。如果要进一步反思,为什么只能是一个面孔、一个声音,这是由于把哲学的性质和功能片面化

①② 冯契著:《冯契文集》第 1 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4 页,第 6 页。

了。什么叫哲学,在有些人看来,仅仅是一种作为政治工具的意识形态。所谓百家争鸣,其实是两家:一家是资产阶级,一家是无产阶级。而一旦被认定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观点就是不容置疑、不容讨论的,它的表达方式就是领导人的语录汇编、注释。

冯契在这方面的自我反省是十分深刻的。他说: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些人把理论和政治权力捆绑在一起,使理论失去了独立性和内在价值,甚至成了整人的工具。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斗争,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紧箍咒,强加在人们头上,这明显违背民主教育的态度,使得学术自由窒息了。这种‘左’的倾向,到‘文革’时达到了极点,给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冯契并没有把问题全部推到社会环境上,而是以可贵的自我批判精神拷问自己:“哲学家如果不能始终保持独立人格,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那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哲学家。”^①他特地引证了《荀子·解蔽》篇中的话:“故口可劫而使墨(默)云,形可劫而使诘(屈)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然后说:“不论处境如何,始终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自由选择是可以办到的,我认为这也应该是‘爱智者’的本色。”

在那些困难的年代,有多少人有这种自觉呢?大概不多。否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员便不会被人视为《李有财板话》中的“常有理”了。1978年,一位工农兵学员对我说:“我们的哲学教员都是芭蕾舞演员。”凭直觉我立即便知道他指的是“转得快、转得圆、脚跟不着地”的学风。这个批评一直使我刻骨铭心。当然,不能苛求每一个“哲学工作者”都为这个尖刻的批评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在像“文革”那样残酷的政治环境中,保持思想的自由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的。但这种批评令人反省的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最具有批判精神的理论,它既是在批判旧世界中产生的,也是在不断作自我批判的过程中成熟的,为什么它到了中国哲学界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变成了毫无批判精神的权威思想的装饰品?

二

任何理论体系都会有时代的局限性,而构造这个体系的方法论却往往能超越这个体系及其结论,因而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就冯契思想的方法而言,主要有三条:一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二是会通中西哲学,三是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统一。

思想有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任何一个理论家想要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作出创造性的贡献,那就一定要贯彻逻辑和历史统一性的原则。现实中的问题,并不能简单等于理论自身的问题;只有经由本学科内在的逻辑和历史的辩证运动折射出来的问题,才能成为本学科的新理论问题,并推动本学科的发展。不经过这种加工,直接把现实中的矛盾简单等同于理论中的问题,把时政宣传口号当做哲学论证的结论,这就把理论庸俗化了,甚至使理论丧失它自己应有的品格而成了一种见风使舵的投机现象。

当然,冯契在自己的智慧说三篇中,没有像上面那样明确提出问题,自然它就没有正面地来阐述理论联系实际与逻辑和历史统一性的关系。但是,有两点是非常明确的:第一,他说,在自己的研究中贯彻了“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的观点。^②这就是说,他自觉地贯彻了逻辑和历史统一性的原则。第二,他认为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是把握具体

^{①②} 冯契著:《冯契文集》第1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第21页。

对象和具体真理的方法,而且他还以经济学和经济学史、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举例说明之。他说这是研究认识论的基本的方法。

我之所以要把冯契没有充分阐述的逻辑和历史统一性原则突出出来,当作他构造哲学体系的第一条方法论原则,是因冯契在理论上的实际成就,都得益于此原则。反过来说,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哲学成就不大,就是因为背离了这一原则,使理论走上了庸俗化和异化的歧途。

理论联系实际是理论生命力之所在。但是没有一定的理论修养,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修养既不可能在头脑里凭空想出来,更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只能从前人理论联系实际的创造性研究成果中获得。这就是从理论联系实际中学会理论联系实际。哲学是一种历史性思维,不懂得哲学思想的发展史,只记某种思潮或主义的结论,是不可能真正懂得哲学的,即使是头脑中记得烂熟的结论,最多也只能是些望文生义的了解而已。

在哲学史被编入“另册”的年代,冯契能够从新时代的高度出发,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哲学史,并从中总结出自己对哲学的独立看法。他说:“当我把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作为研究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史领域,力求按历史的本来面目了解它时,很自然地表现为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在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展开,同时它又成为中国哲学史的概括和总结。这样一来,哲学当然就有了一种新的面貌,不仅不同于一般哲学教科书的那种形态,而且具有了中国特色、中国气派,成为中国哲学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①

至于会通中西哲学,则始终是冯契哲学活动的另一项重要的指导原则。他说:“‘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就哲学而言,现实生活中即革命和建设中的‘古今、中西’之争制约着哲学的发展”;“一般地说,凡是在近现代史上起了积极影响的哲学家,总是善于把西方的先进思想和中国优秀传统结合起来,以回答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从而作出创造性的贡献。这样的哲学因为回答了时代问题,就体现了时代精神。”^②他认为,自己也就是要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前进,“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并进而会通中西,解决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便应该能达到一种新的哲理境界。”^③

会通中西、创造哲理的新境界,并不是冯契的新发明。20世纪以来,这曾经是不少人的追求目标,而且也产生了冯友兰、金岳霖等颇有建树的人。在“智慧说三篇”中,冯契经常提到他的老师金岳霖。他自觉地要在金老等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前进,而且他确实是前进了。在会通中西、创造新哲理方面,他越过了自己的老师。他达到这种哲学境界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在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以前,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来观察现实、来总结中西哲学。他说:“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哲学任务,就是要根据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来阐明由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的辩证运动。”^④显然,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并不是教条主义的,而是独立思考的,尽管他还没有完全克服这一代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误解。

冯契对中西文化和哲学的冲撞与会通的认识,比前人要深刻多了。他不是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或“中西兼用”等抽象的公式与原则入手,而是从总结以前

^{①②③④} 冯契著:《冯契文集》第1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2页,第4—6页,第13页,第16页。